责任编辑：云帆 E-mail:yunfan73@yahoo.com.cn

参考文摘

新 论

“为民做主”还是人民民主

——“三为民”的深刻内涵与实践意义

郝侠君在2003年11期《党政干部论坛》上撰文说，胡锦涛同志倡导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精神，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是由三方面规范性价值取向所构成的有机的统一整体。它的观念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有特色，并有创新：观念内容广泛、完整而深刻，涵盖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基本关系、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语言形式鲜明、简洁、精练、整齐，全面而准确的表达了所包含的观念内容及其本质。

郝文说，翻阅多本权威性的辞书和语法著作，领悟到“三民”精神关键就在“所”字之用，“所”字用于一定的语句结构中，就会显示或突出某种主从关系、主受（主动与受动）关系、统属关系或归属关系。

胡锦涛同志原话每句都用一个“所”字，这就突出了“所”字之上的引领者“民”即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显示了用权、谋利、系情等行为及其隐含的直接主体领导者对于人民的从属地位。如果不然，没有用“所”字，句中的“民”即人民就失去了主体地位，而成为领导者用权、谋利、系情等行为的“恩赐”对象了。简括言之，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民民主思想，后者则不过是旧时代的“为民做主”思想。

■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民民主思想，后者则不过是旧时代的“为民做主”思想。

郝文说，“三民”精神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学的一个重要创新理念。其重要创新之处在于：（1）一般领导学著作所讲领导主体只是指个体或集体的领导者，“三民”精神在承认这样的领导者是领导行为的直接主体同时，特别突出了作为国家社会主体的人民，视之为对领导行为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根本主体。（2）一般领导学著作对领导行为中的情感因素重视不够，而且侧重讲排除情感情绪的消极影响；“三民”精神特别重视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把领导同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系提到了鲜明突出的重要地位。（3）一般领导学著作也讲到我们领导者的公仆本质，但像“三民”精神这样从用权、系情、谋利三方面刻画人民公仆的完整形象及其本质，则是从未有过的。

同上述理念的创新相对应，“三民”精神提出了一种新的完整的领导行为范式。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突出了民主要求，集中注意力于确立人民为主的价值观念，无论是对待权力还是对待利益，都着眼于此；实际上只有如此才可能进一步解决真正落实科学决策应有的民主程序问题。二是突出了情感要求，把“情为民所系”视为真正按照人民意愿去运用权力谋取利益的核心先决条件。因为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没有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牵挂，就一定不会全身心地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之中。

郝文说，也应该看到，对相当一部分干部来说，“三民”精神还不过是“应然”的目标，远没有化为现实的行动；尤有甚者，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以致趁群众危难之机丧心病狂地谋取私利。这就说明，很有必要进一步在干部中进行“三民”精神的宣传教育，同时坚决打击那些腐化堕落分子，从而使“三民”精神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贯彻落实，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同期刊出许圣元的文章则指出，新一届中央领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一步具体提出“三为民”的标准，不是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而是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到中央及地方党政领导的行动，大事小事、时时处处都具体地落实着、实践着。

新一届中央政府着重解决社会反映强烈、严重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果断废止实施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及时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影响深远。要求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资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把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作为维护改革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来抓；在抗击非典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如加大财政投入，对农民和贫困群体非典患者实行免费治疗，号召实行全民总动员，采取“群防群控”等。党中央还根据群众反映较大的一些问题，研究决定了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新闻报道，对领导人出国访问等都作了规定，并公之于世。对群众不满、怨声载道的报刊散滥和摊派发行问题，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种现象得到明显改观，各地立说立行，如今已见成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些重大举措都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突出体现。

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两个务必”，提出了“三为民”思想，并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当时尽管条件艰苦，国事繁忙，还是坚持在西柏坡过夜，并带头交足饭费。胡锦涛主席首次出访便取消迎送仪式。温家宝总理下基层不要陪餐，对饭菜的要求仅仅是“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已跑过了全国1800多个县市，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以安民心解众难。在非典疫情最肆虐的时期，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心系人民，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亲临疫情严重的地区视察，指导抗击非典工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自己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勤政、亲民爱民的实际行动凝聚了党心、民心，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困难，实现全面小康的信心和勇气。

许文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的干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直接影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地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一切权力的所有者，领导干部是被人民推选、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的。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有的领导干部只能掌权为民，绝不能以权谋私。

许文提出，为了使“权为民所用”真正落到实处，免走歧途，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置于脑后，这样做必然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党的形象。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念，牢记胡锦涛同志讲话指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为民谋利是多方面的，大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小到关心每家每户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子女教育、就业就医等等，一切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领导干部都要一一放在心上，及时帮助解决，不能推诿、拖拉、漫不经心，尤其是要注重解决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

（摘自《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11期）

时 评

从总结看作风

《人民日报》凌焕新的文章说，年终岁尾，回过头来看看一年走过的路，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出明年的奋斗目标，是我们的传统做法。抓好这个环节，对于来年的工作、学习得到进一步改进，大有帮助。

总结需要求真务实，讲求科学，否则非但无益，还会产生种种副作用。且看以下几类总结：

“喊口号式”。有的从国际说到国内，从中央说到地方，讲得似乎很全，站得似乎很高，然而，自己做了哪些工作，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经验，来年有哪些打算，大多空空洞洞，语焉不详。

“摆土豆式”。有的满足于罗列事情：开了几个会、发了几个文、搞了几项活动、完成几项任务，一应俱全，没有深入分析，缺乏理性思考。有的则是照猫画虎，今年抄去年，下面抄上面，应付敷衍。

“做文章式”。有的热衷于“妙笔生花”。观点精心提炼，内容苦心剪裁，文字刻意润色。既有“四六句”，也有百分比；既有面上概括，也有典型事例。念起来是朗朗上口，听起来是热热闹闹，内容却是空空荡荡。

“吹气球式”。有的单位和部门工作平平庸庸，甚至过失不少，但总结时故意拔高、移花接木，把自己“妆扮”得如花似锦，而对缺点与问题，遮遮盖盖，躲躲藏藏，避重就轻。

“打手电式”。有的也注意查原因、挖症结、找教训，但往往只有抽象没有具体，只讲客观不讲主观，只查他人不查自己。单位出了事，怨社会环境差；工作没做好，嫌部属素质低；先进没评上，怪上级不公平……见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文章说，能不能搞好总结，领导和机关的态度与作风至关重要。愿各级领导机关改变“关起门搞总结、看材料论优劣”的做法，把步子迈出去，把身子扑下去，看看基层工作怎么样，亲耳听听老百姓怎么说，问问干部群众怎么办。端正总结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就能够在总结经验中真正有所收益，有所进步。

（《人民日报》2003年12月31日）

超载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路乱收费

5省区市联手向公路超载发起讨伐以来，进京的北京——大同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人员说，进京的运煤车现已“减少了80%到90%。”

据了解，以一辆限载18吨的卡车，超载至45吨这一“常规超载”运输煤炭计算，从大同拉一趟煤到唐山，车主可收入1450元。限制超载后，载重18吨卡车拉一趟煤要亏1330元。

据山西省交警介绍，在超载严重的山西省，自超载超限联合行动开始后，原来超载率达100%的运焦车已经大为减少，但运焦车辆出车率只有以前的1%。

国家发改委董焰指出，一吨煤出厂仅50元，但经过公路各个收费站后，最后的价格会涨到近200元一吨。煤炭的利润都被流通环节吃掉了。

公路运输不只是公路建设单位要收费，环保、税务、工商等凡是能与煤搭上边的部门，无不上路收费。

一位专家调查计算显示：一辆18吨卡车超载至45吨，从大同运煤到唐山，通常煤主支付的运费每吨为140元，这样，车主收入的总运费是6300元。其中，需要支付2000元以上过路费用——包括往返过路费1200元、超载罚款800元，另有养路费、保险费等；另外，油料费开销1600元左右，加上沿途住宿、人工、车辆养护和折旧等，共占到总运费收入的1/3。最终真正落到车主手里的利润不过1000元出头——原本每吨50元的煤，运输到位后的价格变成了每吨190元。可见，其中仅用于公路收费一项支出，就将使煤价上涨一倍。

反之，如果不超载，载重18吨的卡车运费每吨仍为140元，车主的总运费收入将减至2520元。这笔钱公路收费方面需要支付1200多元（包括往返过路费、养路费、保险费等），占到全部总运费的1/2，而每吨煤将因此增加65元，超出煤出厂价格一倍以上。测算表明，在不许超载前提下，如果保证车主所得利润不变，每吨煤的到货价格必须达到360元左右，这显然大大高出市场承受能力。

因此，现在的情况变得十分尴尬——在限制超载的情况下，煤炭公路运输几乎陷入瘫痪。在董焰看来，要解决问题，必须使限制超载与整治公路乱收费同时进行。

（《财经时报》2003年12月19日）

法治的困境：一些官员不守法

陕西省府谷县政府拖欠一施工公司工程款而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累计已经达到了380多万元。当施工方表示不给钱只好起诉时，主管的副县长竟蛮横地说：“起诉你的，那是你的事嘛，到头来有屁用，谁还能把县政府的门关了！”

听罢副县长的话，可以料想讨要工钱的人将会多么绝望。在法律治下的社会，法律是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最终极的选择，如果连法律都无力提供救济，显然意味着自己的权益铁定受损，无法挽回。副县长虽然不是法官，没有司法审判的资格，但是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言，他的话对事情最终结果的影响甚至比基层法院的裁定还具有决定力，因为他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地政府的态度。在法治建设并不完善的基层社会，基层法院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力量角力谁占上风，一目了然。

年终来临时的这场清理农民工欠薪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同时也显现了法治的诸多困境。政府可以运用强制力，将欠薪的企业逐出本地市场，或者通过其它行政手段帮助农民工讨薪，但是当政府成为欠薪的主角时，农民工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工面对的是一个守法的、对法律还保持应有敬畏的政府，他们的权益还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不幸遭遇如这位副县长之类的政府官员，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否意味着像一滴水在时间流失中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官员不守法，这正是当下法治建设的困境之所在。官员不守法，首先表现在对法律没有信仰，内心深处没有认可法律的权威。其次表现在行为上不守法，无视法律，甚至违法行政。再次表现在对司法部门的轻视上，认为当地法院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胆力对政府实施法律制裁。

官员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严格遵守法律，服从法律的威严。因为官员掌握着一定的国家权力，如果官员不守法其危害性要大于成百上千个普通公民的不守法，因此，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官员首先要守法，然后依法行政。唯有如此才能解开并理顺当下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现象。清理农民工欠薪问题也应当如此，政府官员要带头遵守合同遵守法律，带头还薪，如果债权人诉及法院，法院应依法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否则，只会越理越乱，越理越难。

（人民网 作者 刘吉涛 2003年12月22日）

纵 横

包公崇拜与法律信仰

丁国强就学者徐忠明的《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一书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说，包公故事不仅是一种文学叙事，更是一种法律叙事，体现着传统中国人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法律心态和法律情感。

从《宋史·包拯传》到戏曲小说野史笔记，包公故事里面隐含着民间向司法权力发言的一种精神需要。在官府的话语霸权面前，小民百姓的声音被大大遏制。他们本不愿动官，但被逼无奈时便跑到衙门口击鼓鸣冤，在希求得到司法救济的同时，又心怀对贪官污吏、官官相护、葫芦僧判葫芦案的恐惧，司法的不确定性给百姓造成心理上的无所适从，而包公则成为一个心理安全阀。平民百姓在包公故事的叙述中获得了对公平正义的想像性满足。在包公故事的流变中，民间的叙述者扮演了虚拟的司法官的角色，所谓的“包公”断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的司法想像。包公是维护王道政治的“劲正之臣”，在司法中则是一幅刚毅正直的威猛形象，其断案智慧主要表现在对案犯心理的深刻体察、对证据获取的谲诈，以及对法律与人情的双重考量上面。他所追求的司法目标是“仰合天道，俯顺人情”。他是关公一样的象征性人物，寄托着草根社会的爱憎。随着文化权力的下移，无论是瓦舍勾栏里的宋代话本还是元代杂剧、明代传奇戏曲，都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平民百姓对听讼断狱的兴趣。在官场黑暗、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年代，对正义无比饥渴的人们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凸现这种意愿。民间对包公的神化近乎登峰造极，诸如“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等等。正义愈匮乏，弱者越是需要心理补偿，越是想入非非，他们企盼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实现公平正义。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不难理解包公故事中的夸张成分。

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人的稀缺。由此可见，包公故事的终结是回归常识和理性的标志。靠“黑脸”来摧折权贵、靠“青天”来为民作主，是极其微弱和迷茫的。

（《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6日）

中国企业如何在微利时代赚钱

《经济日报》刊载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博士，美国《财富》杂志签约专栏作家姜汝祥的文章说，有专业数据显示，目前在与人民生活相关的500多种产品中，供大于求的占80%，几乎没有什么是供不应求的。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产品也正在以同样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一句话，我们的企业面临的已不再是“暴利”时代，而是精耕细作的“微利时代”。

所谓“微利时代”首先是对“暴利”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暴利时代更多的是“机会”造就财富，而在微利时代，机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独特的商业模式，或者有特色的产品或服务。

以今年全球500强的第一名沃尔玛为例，它是以“天天低价”而闻名于世的，但不要忘记沃尔玛的利润比去年增加了20%。也不要忘记沃尔玛的经营方针是，沃尔玛真正吸引顾客的是它超越顾客期望的服务。

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沃尔玛的做法就是把竞争的重点放在不断地为顾客创造价值方面。全世界几乎所有优秀的公司都不会一味地去追求“暴利”机会，而是去追求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产品提供的价值是有限的，但企业能够附加在产品之上的服务或价值却是无限的。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展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保持一个老客户回头的八倍，类似这些做法可以使企业的利润实现几何级数式的增长。

像这类通过对赢利价值链进行精心耕作的赚钱方式，可称为“柔性赢利模式”。当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既可以通过供应链的整合，通过业务流程的重组，通过财务费用的紧缩来降低成本，也可以通过对特定客户群的优质服务，通过老客户的回访，通过对重点市场之间的平衡来获得收益。

建议目前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的企业都不妨去做一个设想：如果你目前的所有的客户都没有了，你怎么办？或者你去想，如果你目前所有的畅销的产品突然滞销了没人买，你怎么办？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柔性的赢利模式”：可口可乐的老板敢说，即便我的厂房全都化为灰烬，我也能在三天之内重建可口可乐，这种夸口背后是可口可乐有一批忠诚的消费者。

这种夸口给我们什么启示？中国企业如果不想在世界商业舞台上永远做一个低层次的制造商或加工商的话，就需要给自己做一个假设：如果有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我们的路在哪里？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经济日报》2003年11月20日）

逸 事

胡适的“脾气”

山西作家韩石山对鲁迅和胡适有一个评价：“读鲁迅长脾气，读胡适长学问”。鲁迅的骨头硬，脾气大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大家都承认；但是鲁迅的学问何尝不是天下一流，他的国文、诗词、小说研究、翻译、考古甚至书法，都是独步一时，随便拿出一项都可以当教授、当博导。如果光有大脾气而没有大学问，光有骨头硬，没有学识硬，鲁迅又怎能被称为文化大师。

而“读胡适长学问”，也容易给人误会，似乎文通古今，学贯中西，挂着35个博士牌子的胡适，就是骨头太软，没有脾气，不敢抗争，只会妥协，风节差点，过去也一直这么宣传。现在看来，其实未必，胡适虽然多以温文尔雅形象面世，但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胡适真发起脾气来，丝毫不亚于鲁迅。

1909年，胡适在上海读书，20郎当岁，脾气就不小。一天夜里，路遇警察盘问，一言不合，竟然和警察动起手来。他当然不是警察的对手，不仅被打得鼻青面肿，还被关进了拘留所。这是少年孟浪，或许不足为训。

1930年他可是堂堂留洋博士了，又年近“不惑”，但脾气还会“偶而露峥嵘”。《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一听，来脾气了，他给陈布雷写信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权威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他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善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这话连“大脾气”的鲁迅都未必敢说出来，可偏偏是“没脾气”的胡适说的。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特工头目）。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此说颇有魏征骨鲠之风。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更是虎头上拔毛，要冒大风险的。事实上，国民党当局还就是有“收拾”胡适的打算，只不过忌讳国际影响，没来得及动手罢了。

我们曾误会胡适多年，以为他不过是对国民党政府惟命是从的过河卒子，从骨子里说，实际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对当局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的学问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脾气，换言之，他的骨头，也是有硬度的，不仅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那种硬，而且也有剑拔弩张，怒目金刚那种硬。因而，正如读鲁迅不仅能长“脾气”，也能长学问一样，读胡适既能长学问，也能长“脾气”。

（摘自《文学自由谈》 作者 陈鲁民 2003第5期）

社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办公室电话：62805131 广告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6228 网址：www.studytimes.com.cn 电子信箱：xxsb@263.net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99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照排：学习时报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